

关于群体性事件发生规律的10个判断

——基于参与者行为特征的分析

王新超¹, 林泽炎², Jing Sun³

(1.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2. 中共重庆市委研究室, 重庆 400015;

3.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摘要】群体性事件已成为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问题。从现有研究看,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描述及其发生的原因分析较多, 但对于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特点分析较少。本文以国内外社会学、心理学相关领域的理论为依据, 结合国内群体性事件的一些特点, 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 尝试提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描述模型, 并据此对群体性事件发生规律给予尽可能的判断。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 参与者; 行为特征; 发生规律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11)01-0013-04

群体性事件已成为政府与专家高度关注、急需解决的一个突出的社会性问题。目前,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事件本身的描述及其发生原因的分析, 而对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特点分析较少。本文尝试依据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 结合国内群体性事件的一些特点, 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特征进行分析, 提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特征描述模型, 并据此对群体性事件发生规律给予尽可能的判断。

一、群体性事件与经济社会发展、人员素质的关系

针对群体性事件, 已有研究更多是对于这些事件的性质、类型、原因等的分析, 也有旨在帮助政府治理与应对此类事件, 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和建议。此类研究认为群体性事件主要还是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因

素引发的矛盾, 以及社会不公平的结果导致的。应该说, 群体性事件是不同社会群体对公平的认识, 以及自己的利益相对“被剥夺”感的反应。尽管这些群体性事件具有社会治安型、生存状态改善型、经济纠纷型、关注社会公平型, 以及历史遗留问题型等多种样式, 但这些问题集中在这样一个时期表现出来, 还是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存在直接关系的。比如, 对改革产生的震荡的心理承受能力, 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快与相关政策的滞后, 以及管理手段的落后, 政府与相关组织管理者素质的落后等, 都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因素, 或是诱发因素。尤其在现阶段, 一旦相关利益关系没有得到及时处置, 各种直接或潜在的诱发因素都有可能使利益相关者长期积累的“不良”或“恶性”社会心理情绪,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爆发出来, 从而转化为聚众行为的反应模式, 表现为群体性事件(朱力, 2009; 陈晋胜, 2004; 梅珍生, 胡静,

【收稿日期】2010-08-21

【作者简介】王新超,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 林泽炎, 中共重庆市委研究室副主任, 研究员, 博士; Jing Sun, professor,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Griffith University, Australia.

2006; 沈惠章, 2006; 谭和平, 2007)。

通过对部分地区群体性事件的调查, 发现群体性事件发生量与地区经济发展指标 (GDP) 存在一个直线相关关系, 见图 1 所示。伴随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 当地的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也在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和谐稳定调查”课题组在《2006 年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状况调查报告》中也指出了类似现象, 报告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激化可能性的判断是, 东部明显高于中西部, 城镇明显高于农村, 专业技术人员、干部、在校学生明显高于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 甚至高于无业失业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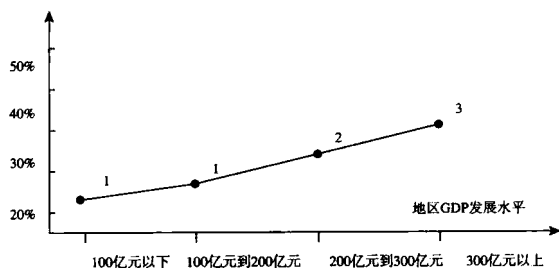


图1 某地不同市县经济发展水平 (GDP)
与被处理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作出如下初步判断:

判断1: 群体性事件会伴随经济社会发展有一个增多的趋势, 这种现象也将对社会发展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判断2: 在社会转型时期, 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愈高, 人员素质愈高, 对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激发或促进作用愈强。

二、群体性事件与参与者动机的关系

在传统社会学研究中, 对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也是强调对事件产生原因的分析, 特别强调对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动机因素进行解释, 如“社会群体理论 (Mass Society Theory)”、“相对剥夺理论 (Relative Deprivation)”、“集群行为理论 (Collective Behavior Theory)”等, 都是早期对群体性事件分析研究提出的典型的观点 (Oberschall, 1973; Tilly, 1978; McCarthy & Zald, 1973, 1977; Gamson, 1975; Paige, 1975; Jenkins, 1981; Jenkins, 1983)。在这些理论中, 比较共同的认识, 就是强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社会

上存在少数人的不满因素, 这种短暂性的不满情绪, 会由于一个特定时期的外在因素的诱发与促进, 在社会上、人群中产生突然的、强烈的聚众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就是由特定人或特定群体参与, 参与者具有较为一致的动机、目的, 并且在活动过程中, 会出现严重违法行为, 破坏社会治安秩序, 以及危害他人或公共安全等。这些分析与研究认为,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行为是一种理性分析的行为, 是对不同层次的行为成本与收益比较判断后的一个理性决策。另外, 通过这些利益冲突的表现, 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是利益关系的处理, 而是调整社会权利关系的一种有规则的群体行动。在当前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聚集性、有结构化的群体性事件逐渐成为一种相对来说更有效率的改变资源结构的手段。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集中性、组织化的特点, 已成为新的关注点。自2006年始, 群体性事件反应更严重, 聚众、组织性更高, 群体提出的需求申诉也从以往的比较单一、明确转向模糊、更广泛, 往往超出实际水平。如万州、瓮安、石首等群体性事件中, 就表现得比较典型。传统观点比较强调社会群体的需求被剥夺, 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突然爆发 (Gusfield, 1968)。但目前的研究认为, 这种被剥夺的需求申诉在群体性事件发生中仅发挥较次要的作用, 只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一个诱因, 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来说, 群体的资源、组织性、集群的机会等相对长期化的特点, 才有可能更多的影响到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的过程及结果 (Tilly, 1978; Jenkins & Perrow, 1977; Korpi, 1974)。看来, 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即研究重点, 从对外部因素的关注上, 开始转向对群体或组织的内部动力与机制的探讨上, 特别关注群体活动中有可能产生各种影响的人员行为的研究, 包括他们的行动策略、相互影响的行为模式, 以及对群体性事件的环境特点的分析 (Marc Edelman, 2001)。

判断3: 群体性事件作为参与者的一种理性行为, 有可能更强调行动的策略性, 以及行动的政治目的。

判断4: 从少数人群、个别地方以申诉自己利益的方式产生的群体性事件, 会逐步发展演变成集中性、有组织性群体性事件, 在申诉的内容方面, 提出的要求会超出其实际需求。

三、群体性事件与参与者对 特定诱因认知的关系

格拉德威尔(2009)认为,表面看起来很稳定的社会结构,其实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只要能找到一个潜在的“引爆点”,轻轻的触动,就可以使这种表面坚固的结构产生倾斜,甚至快速的倒塌。根据对各种不同社会现象的观察,格拉德威尔提出了一个群体性事件产生与发展的内在模式,认为群体性事件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三个主要的特征:传染性、微小的变化产生巨大的效果、变化是突发而不是渐进的。

“传染性”,强调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或者影响其他人员的行为,其本身具有一种在人群中产生共鸣,引发周围人同情,以及激发人们参与的情绪上冲动的特点。当然,这种传染性不是对所有的人,都产生相同的效果,而是对于一些有“特殊体质”的人,更容易“被传染”,并且,在群体中存在传染的渠道与参与的介质。如果能在有效的时间采取措施,就可以阻断这种行为与情绪信息的流传,并能有效阻断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另外,这种快速爆发的事件,往往是通过一个微小的原因引发的,正如俗话说,“一只蝴蝶翅膀的振动,可以引发遥远地方的一次地震”。如果一开始人们就能灵敏的意识到可能产生群体性事件,主动的控制与处置就会比较及时,产生的后果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与程度内。事实上,我们很难察觉所有变化,并将其控制起来,再者,这在社会管理与组织管理中,也是没有效率的一种行为。

通过对产生与形成群体性事件的因素分析,我们应该可以确定存在不同性质的事物,以及在群体中具有扮演不同角色的人。

判断5:在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上,存在不同性质的诱因,一类事物对于诱发群体性事件,不具有敏感性;另一类诱因对于诱发群体性事件有更强的敏感性,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

判断6: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发展来说,除情境中存在诱发事件的特定事件与物质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具有扮演特殊角色的个人,这些活跃分子本身具有个人特殊的个性,并且他们的活跃程度,能决定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可能性大小,以及持续时间的长短。

根据图2的示意模式,图2A代表此类诱因对人

们行为的影响持续增强,不管被剥夺,还是得到满足,总是让他们感到不够,需求是持续增长的。图2B代表此类诱因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不重要,满足也无所谓,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需求可能是下降的,甚至被剥夺也不会产生强烈的需要意愿。图2C表明,这类诱因虽然使人们有一定程度的满足,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对需求的敏感性就会下降,但应有一个基本的需求。图2D表明,这类诱因只有在被剥夺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获得的意愿,但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需求意愿会不敏感,并趋于缓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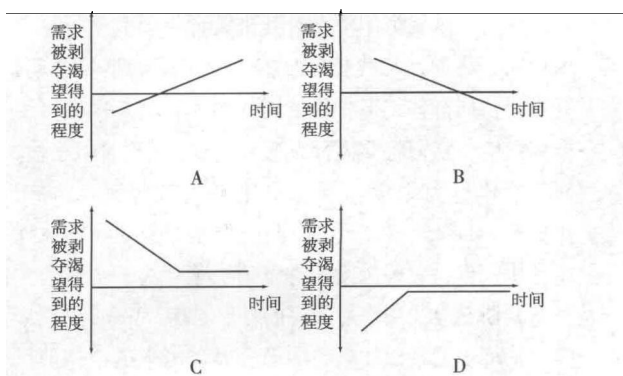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类型事物与群体性事件
形成之间的关系模式图

注:图中横坐标代表时间,纵坐标代表群体中的成员需求被剥夺后,产生的要得到满足的意愿程度,向上是正的,代表得到满足,或没有被剥夺;向下是负的,代表没有得到满足,或被剥夺。

以上分析表明,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会因人们对这些不同诱因的感受、反应不同,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性质与程度也不同。根据心理学对人的需求认识的观点,如果一种需求是增长型的,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会产生更高的需求意愿,这样的诱因通常会因在人际之间,或人群之间的比较,产生心理认识上的差异,导致不满足的反应,但是,是否会促成行为,恐怕还要区分这种诱因对个体生存的意义,以及被剥夺的程度。另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比较结果如何,必须确保一个基本的要求,这种诱因缺失时,人一定会产生强烈的需求,但在逐渐得到满足后,需求的迫切程度会下降,总之,它们不会产生持续、持久性的行为反应。

判断7:对于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与处理,应该区分不同性质诱因的影响差异,需求的被剥夺与否,以

及公平与否,并不是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因素,要区分不同事物在人们心理上的反应类型,以及反应的程度差异。

四、群体性事件与参与者决策行为的关系

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到底是如何认识各种诱因并决策个人行为的呢?Wang认为在风险情境下,参与者的决策行为会更多地受到情境线索的诱导(Wang, X. T., 2008)。过去很多研究结果倾向于突出个人特点的作用,承认个体特点对其决策行为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比如,自我控制低的人更易受到情感影响,并直接认同群体;但自我控制强的人,只是间接受群体影响,强调将群体行为视为一种工具性价值手段,对于群体行为采取一种工具策略的选择(Giguere, B., & Lalonde, R. N., 2010)。但不能忽视在群体性事件中,作为一种风险条件下的决策行为,个体的选择与判断,会受到情境因素的强烈干扰。Wang研究证实,情境中的特定线索,的确会对情境中的个体的风险偏好与选择,产生明显的影响(Wang, X. T., 2008)。在具体的决策活动中,个体的理性选择变得更狭窄,表现出更明显的有限性特征,但外在的信息与线索,比如群体的规模,来自权威人士的信息,情绪化的行动模式选择等都会强烈的影响参与者决策行为的选择(Kühberger, 1995, 1998; Levin et al., 1998; Wang, 2008)。

判断8: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的个人决策行为,不仅受到个人的心理特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更容易接受外界的特殊线索与信息诱导,更容易接受符合他们个人需要的解释,而拒绝现实的客观、合理的理由。

五、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行为规律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个人,是如何被认同为一个群体,他们是自己接受自己为一个群体,还是被外面的人认为是一个群体,从而引起他们也只有接受这个事实,还是他们感到他们相互之间有更多的共同品质,或者与外界的其他人员有很大的差异,从而认同自己是一个群体(Tajfel, 1981)。这些因素在决定群体的

形成中,以及影响群体存在的持久性上,从治理的角度看,即对解决群体问题,或干扰与拆散群体的工作,应有重要意义。

关于群体行为有两种可能的合理解释,一个是人们的情感认同,或者是情感上依靠的需求。另一个是行为策略的选择,这样的方式能更好的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Giguere & Lalonde, 2010)。人们将加入群体作为一种策略行为时,主要基于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群体行为能给个体改善自己的处境带来更大的收益(Tajfel, 1981)。这种很现实的考虑,将人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动机,看作是一种工具价值观(instrumental value)操作的结果,个体要认知并接受这种工具价值观的效果,从而决定是否卷入群体性事件中,从而得到最大的好处(Louis et al., 2005; Feather, 1982, 1992; Finkle & Muller, 1998; Finkle & Opp, 1991; Klandermans, 1984; Simon et al.,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4; Stürmer et al., 2003)。这种主观效价认知,会随着个体对群体与自己关系的分析,以及是否卷入群体的判断,发生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改变应该是在加入群体的决策初期,会出现矛盾的心理活动,一方面希望能加入群体,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得到更好的利益。另一方面,加入群体可能具有风险,又使其不敢马上采取行动,而是采取观望的态度。但一旦决定进入群体后,价值的判断就会产生一个快速的变化,对风险与退出的思考应该退到次要的地位,更深入、更广泛的卷入群体就会成为一个不断被强化的概念。如果说在加入群体之前的决策,更多体现为个体对自己所认知的价值与效价的判断,但在进入群体之后,决策的价值判断,就会受到群体内部的态度取向的影响,个体行为的选择变得狭窄,而对于需要满足的利益申诉,反而变得更广泛,也开始模糊了。

判断9: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需求申诉会受到群体的影响而变化,进入群体前明确与具体的需求申诉,会由于加入群体而变得模糊,并产生广泛化的趋势。

判断10:如果说在加入群体前,参与者的价值判断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的思考,而加入群体后,对群体的认同,以及与群体外人员的隔绝感,使群体成员的决策,变得更具有情感性的属性。

责任编辑 李江涛